

汤显祖灵根睿源论（上）

邹元江

—

摘要：我们很难将一个公认的明清举业大家的汤显祖与一个流芳千古的剧诗大家的汤显祖联系起来。本文正试图回答这个难题。本文认为，汤显祖的灵根、灵性、奇士说，并不仅仅是他对艺术创造和审美灵境的感悟，而更重要的是他对诗意的开显、照亮生命境界的执着，因而，他能处处以离致独绝的生存状态超越着现实困厄，甚至场屋之累，将扑朔迷离、说不可说的灵气、灵性、灵根的慧命，通过能体现整体的生命气象的独绝的思想、独立的人格、独步的创造，让人能感性直观到、体验到、欣赏到。他生命中“自为龙耳”的灵根、灵性，不疏于感性世界的陶养，亦不蔽于道气睿源的开启。

关键词：灵根；奇士；独创性；诗意；

中图分类号：
码：

文献标识

文章编号：

汤显祖是举世公认的剧诗大家，然而，汤显祖在明清时期也是极有影响的举业大家。毫无疑问，剧诗之思与举业之思是相悖逆的。那么，该如何看待这个似乎是悖谬的矛盾呢？本文正试图回答这个难题。

—

汤显祖特别重“灵根”、“灵性”、“灵气”。他说：“独有灵性者自为龙耳。”[1]（P1139）又说：“自然灵气，恍惚而来，不思而至。怪怪奇奇，莫可名状。”[1]（P1138）

“灵性”、“灵气”如此神奇，又如此潜蕴着巨大的审美创造力，所以，汤显祖评价古今诗文总是探赜其“灵根睿源”。[1]（P1146）而“灵根”、“灵气”、“灵性”不是所有人都天性秉成的，因此，汤显祖又特别关注能使“天下文章所以有生气者”的“奇士”和“狂”者。

在汤显祖看来，“士奇则心灵，心灵则能飞动，能飞动则上下天地，来去古今，可以屈伸长短生灭如意，如意则可以无所不如”。[1]（P1140）汤显祖所说的“奇士”，就是康德所说的“天才”。康德说：“天才是主体的天资方面的典范的独创性，表现在他对认识功能的自由运用上。”[2]（§ 49）即天才具有一种与身俱来的自由创造力，一种天然资禀，他能够为美、为艺术制定法则，而他又不被这法则所囿。他永远创造典范，可他永远突破自己所创造的典范。他具有独特的感知世界的能力，能将平淡无奇的世界作新的发现，以独特的文化艺术形式建构出怪怪奇奇、又魅力独具的“第二自然”，并赋予它伟大的意味层。所以，康德说：“美的艺术必然要看作出自天才的艺术。”

康德决不会想到，他晚年在他一生也没有离开过的东普鲁士的哥尼斯堡所思考的“天才”之特征，在东方古国有一位哲人、诗人早于他一百多年就已经思考过，而且几近得出与他相同的看法，虽然，在言辞的表达上一个更理性化，一个更诗化。

康德关于“天才”的特征一是抓住了“自由”；二是抓住了“想象力”；三是抓住了“独创性”。[3]而这三点又恰恰是汤显祖极为推重的。

汤显祖说：“不颠不狂，其名不彰。”[1]（P1161）“颠狂”者，即能创造“怪怪奇奇”之诗文书画的“奇士”。他们总是“委弃绳墨，纵心横意”，心灵极为自由，没有典范所依，没有章法所循，而他们却创造典范，立地成法。因而，在“绳墨之外，灿然能有所言”。正是这种无拘无束的自由心灵，才创造出匪夷所思的审美灵境，将寻常的现实世界赋于伟大的或让人警醒、或让人喟叹、或让人升华的意味、意象、意境。

而奇士上下天地间自由飞动，来去古今，“可以屈伸长短生灭如意”的天才能力，正是康德所特别重视的想象力。这种“恍惚而来，不思而至，怪怪奇奇，莫可名状”的想象力，具有着“精骛八极，心游万仞”，“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4]（P66-~67）的巨大审美创造力。那“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然动容，视通万里”的神奇特点，那“神思方运，万涂竞萌，规矩虚位，刻镂无形”[5]

（P295）的无穷魅力，都是趋向创造性的“第二自然”的。

想象力的根本意义就在于创造之自由超越着现实，通过富有能动性和创造性的主体心灵的活动，对现实素材进行化解变形、陌生化凸显，以便更好地把握现实的本质存在和感受理想的可能存在。而这正是康德所一直非常重视的想象的创造性

义。

在康德看来，“真正为天才而设的领域是想象力的领域，因为想象力是创造的，它比其他功能较少处于规章强制之下”。[6]（P57）正因为想象力是创造的，所以，文学艺术对现实世界就不仅仅是简单的摹仿，“诗人的职责不在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可然律和必然律是可能的事”[7]（§9）

（可然律指在假定的前提或条件下可能发生的某种结果；必然律指在已定的前提下按照因果率必然发生的某种结果）。即是说，文学艺术应当按照“事物应当有的样子”[7]（§25）去创造，而“应当有的样子”就正是想象力的领域。

没有了想象力创造的巨大辉光，艺术品无论从内容到形式便都是缺乏“生气灌注”的。因为想象力的劲健正是创造主体情感心灵活力在审美客体上的投射，而审美客体那充满畅神夺魄的美的形式，又正是创造主体刚健的生命形式的投影。所以，汤显祖说“世间惟拘儒老生不可与言文”。[1]（P1138）之所以不能与“拘儒老生”言文，除了这些“拘儒老生”“耳多未闻，目多未见”[1]（P1138）之外，关键是这些人缺少了一种劲健的想象创造力，而这正是他们生命力羸弱的表现。

既然想象力能使诗文书画达到“神矣化矣”[1]（P1138）之妙境，那么，这审美妙境的创造无疑表现为“几不入格”[1]（P1138）的独创性，即康德所说的“典范的独创性”。汤显祖尤为推重的就是这种“奇士”、“狂”者的独创性。

汤显祖说：“为文奇肆横出，颖竖独绝。”[1]（P1142）

汤显祖又说：“奇发颖竖，离众独绝，绳墨之外，灿然能有所言。”[1]（P1161-1162）

还是汤显祖所说：“大小隐显，开塞断续，径庭而行，离致独绝，咸以成乎自然。”[1]（P1139）

无论是“颖竖”、“离众”，还是“离致”，强调的都是自异其伍的“独绝”、独创性。正是有这“独绝”之思，那些“狷者”的“精约严厉，好正务洁。持斤捉引，不失绳墨”[1]（P1137）就不被汤显祖所取。汤显祖“所喜，乃多进取者”，[1]（P1137）即“狂”者。

在汤显祖看来，“狂”者“志极高而行不掩”，[8]（P147）其为文“类高广而明秀，疏夷而苍渊。在圣门则曾点之空，子张之辉光。于天人之际，性命之微，莫不有所窥也。因以裁其狂斐之致，无诡于型，无羨于幅，峨峨然，泐泐然”。[1]（P1137）曾点、子张都是孔子的得意门生，两人都因对“天人之际，性命之微”有

独得之见，或被孔子，或被后人亦褒亦贬。汤显祖所看重的并不仅仅是褒贬之意，而是特别关心他们对“天人之际，性命之微”有无独到的生命体验和辉光气象，有无“试天下第一者”[1]（P1137）的“狂斐之致”。“天下第一者”即有独绝之思，成独立人格，能独步天下。只有自为，而非拟为，才能“求独而致”。[1]（P1137）

而唯有“求独而致”，才能真正将天才、奇士、狂者的想象力、自由落实下来，并将扑朔迷离、说不可说的灵气、灵性、灵根通过独绝的思想，独立的人格，独步的创造，让人能感性直观到、体验到、欣赏到。

由此可见，汤显祖以其颖异不群的灵根慧命，对灵气、灵性、奇士等都有许多独得之见。这不仅表现为他在诗赋书画和人格、思想上都强调独立创造、独特致思的重要，而且即使是写作极死板教条、极强调对经书片言只语也要烂熟于心的制举之文（八股文），他也非常关注主体创造的灵性伸展、独得之见，而反对沉溺于所谓“伎巧”，泯灭人最可宝贵的“离众独绝”的自然灵气。

二

本来，“天下大致，十人中三四有灵性”。灵性也不是唾手可得。而为举子业，“能为伎巧文章，竟伯（百）什（十）人乃至千人无名能为者”。[1]（P1140）这实在是非常可悲的。

举子业，逼迫人沉溺专精于一种经书（汤显祖和他的老师徐良傅都以专治《尚书》而称名），使人视野狭窄，心胸狭隘，灵性尽丧，诗人尽亡。难怪明末启蒙思想家黄宗羲愤懑地说，明代之所以难以出现像杜甫、韩愈、欧阳修、苏轼这样的诗文大家，“此无它，三百年人士之精神专注于场屋之学，割其余以为古文，其不能尽如前代之盛者，无足怪也”。

举子业让人把书读死，把人亦读死，仅就明清两朝而言，真不知戕害了多少灵智之心。从明初到清中叶，人口已翻了几倍，但科举考试录取的人数却增长不多。明朝（1368~1644）二百七十六年间，共取进士 24569 人，平均每年不足 90 人。明中叶后有所增长，但以 1562 年为例，亦不过 299 人。清朝（1644~1911）二百六十七年间，共取进士 26747 人，平均每年 101 人都不到。即是说，明、清两朝五六百年间，增长不过百分之十。[9]（P269）

在读书人中，“士而成功也十之一”。[10]（P251）这“十之一”或许仅指秀才而言，而秀才严格来说并不能称作“士”。“士”者“仕”也，“士”是要为官

的。在那时，即使考上举人都不一定能为官（李贽 1552 年就中举，但因经济困难，他没法再拼得进士及第，只希望能谋个一官半职。可直到 1559 年，才得到一个国子监教官之职，可见之难），秀才就更可怜了。所以，与明、清年复一年考秀才、举人、进士的百万以上科举之人相较，[11]（P54）汤显祖所说的“能为伎巧文章，竟伯（百）什（十）人乃至千人无名能为者”，是十分确切的。

难道制八股之文的文人就少灵性吗？汤显祖认为并非如此。关键是性近而习远。长期埋头于经文中，以此写就的制举之文，再富有灵性的文笔也板涩聱牙。因为，制举之文的呆板文体如深渊地狱，往往窒息生命，泯灭灵性。不过，在汤显祖看来，文故有体，但体是死的，人是活的，体当为人所驭。这正如英秀蜷媚、云气从之、夭矫而舒、凌深倾洗而不可测执的龙，其亦有体，但它仍醇灏丰烨，云气从郁而兴，幽毓横薄，不可穷施。龙何习载！

所以，汤显祖认为，观物之动者，莫不“自龙至极微，莫不有体。文之大小类是。独有灵性者自为龙耳”。而具“独有灵性者”，其文，即便是“制举之文”，也因其“天地古今人理物情之变几尽。大小隐显，开塞断续，径庭而行，离致独绝，咸以成乎自然。读之若疑若忘，恍然与之同情矣。亦不知其所以然”。[1]

（P1140）在这里，汤显祖紧紧抓住自为龙耳的“灵性”不放，强调无论撰文著书，还是赏文读书，都要以“灵性”开启为其大端。而“灵性”之本在“变几尽”。而有变易之文之书，必有“离致独绝”之思致、之会意、之“同情”。而“离致独绝”又恰显其生命的独立不羁、不可重复，亦包括自身对自身的不断超越，因而，其变化万端，自是“不知其所以然”，无有穷尽。

难怪汤显祖被誉为明清举业大家，慕名向其求教者会如此之多，以致汤显祖弃官回故里临川后，仍有千里之外浙江嘉兴的许重熙和湖广石首的王启茂，不辞辛劳前来求教。而广东的钟宗望，为了耳濡目染甚至携家小到临川，一住就是三年。其原因就在于，他们从汤显祖这可领悟到的，并非是如何看、读、记书的秘经诀窍，而是如何自为龙耳的无用之大用，以开启早已被尘封迟滞的灵根、灵性之睿源。

据贺贻孙《澉书》卷二《涤习条》记载，有一个叫黄君辅的后生，在举子业上揣摩十年而不得门径，乃游学于正在遂昌知县任上的汤显祖之门。这时，汤显祖正在创作《牡丹亭》，他对黄君辅苦于举子业很不以为然：

（君辅）每进所业，（显祖）辄掷之地，曰：“汝不足教也。汝笔无锋刃，墨无烟云，砚无波涛，纸无香泽，四友不灵，虽勤无益也。”君辅涕泣求教益虔。先

生乃曰：“汝能焚所为文，澄怀荡胸，看吾填词乎？”君辅唯唯。乃授以《牡丹亭》。君辅闭户展玩，久之，见其藻思绮合，丽情葩发，即啼即笑，即幻即真。忽悟曰：“先生教我文章变化在于是矣。若阆苑琼花，天孙雾绡，目睫空艳，不知何生，若桂月光浮，梅雪暗动，鼻端妙香，不知何自，若云中绿绮，天半紫箫，耳根幽籁，不知何来，先生填词之奇如此也。其举业亦如此矣。”由是文思泉涌，挥毫数纸，以呈先生。先生喜曰：“汝文成矣，锋刃具矣，烟云生矣，波涛动矣，香泽渥矣，畴昔臭恶化芳鲜矣。”趣归就试，遂捷秋场，称吉州名士。

此记载的真伪且不去推究，重要的是看它能给予我们什么启示。汤显祖给求教者所指点的迷津，何止于文章变化之一端。汤显祖所要诏示于人的，是在“时文字能于笔墨之外言所欲言”[1]（P1134）的整体的生命气象和诗意地感知世界的方式。他想告诉人们，真正文章的墨韵香泽，真正的书之诵读、书之用，恰恰在书之外、笔墨之外，在于“灵心洞脱”、[1]（P1135）灵气所至而游目于“天下之股脊喉腮处”。[1]（P1135）

而“灵心洞脱”，灵气所致，恰恰是天才的特征。在汤显祖看来，大致天下生才，虽不能众，亦不独绝，关键是能否把握好“有成有不成”的三条路径：

其一也，儿时多慧，能裁识书名，这本是天之生才，若小心开发这“灵根睿源”，必当文心贻仁，成一代俊才。但父、师往往迷惑于这天之生才，一心将之束缚于传注括帖的《四书》、《五经》上，以求八股之试，金榜题名，光宗耀祖。结果，灵异之心自幼“不得见古人纵横浩渺之书”，[1]（P1134）所以，一但与尘世相邻，也难真切感受这生活的意味。

这实在是汤显祖自己的人生感悟之言。他自小就被人誉为“神童”、“颖异不群”，“五岁能属对，试之即应；又试之，又应，无难色”，书过目能成诵（“剪角书上口，过目了可帙”）。这自然让其父、祖对他寄予殷殷的“文昌”之梦，也过早地让他在举子技巧文章间冷坐枯心。幸得他灵心洞脱，抽暇读家藏数万卷之书，化诸史百家汲冢连山天官地理医药卜筮河渠墨兵神经怪牒等纵横浩渺之书为自己的灵智睿源，因而，其决无鄙委牵拘之识，浅陋地以相天下文章。即便是让人视为畏途的举子业，他也以其博观通识，超凡气象，成一代大家风范。

其二也，与其一相关，一些早慧神童虽泯童稚之心幸为诸生，但终困于灵性未敏达通透。而如此“蹭蹬出没于校试之场，久之，气色渐落，何暇议尺幅之外哉”。[1]（P1134）

这正是明、清两朝每年都在百万以上“蹭蹬出没于校试之场”上的绝大多数人的命运。他们之中虽不乏识时务者，在明中叶后商品经济日益发达中看准时机，“弃儒经商”，或“儒商兼之”，而且，以他们远胜于市人的智慧，“贾而成功十之九”，[10]（P251）[1]但绝大多数人都像范进、周进（《儒林外史》）、西门庆的文书温秀才（《金瓶梅》），和汤显祖笔下的陈最良一样，“灯窗苦吟”、“科场苦禁”，蹉跎蹭蹬一生，嗟叹“可怜辜负看书心”。[1]（P2076）他们之所以“可怜”，正因为虽“四民之业，惟士为尊，然无成则不若农贾”。

陈最良是汤显祖见得最多、被科举制度毁了一生的可怜又可悲的人物。他自幼习儒，十二岁入学，在三年一次的乡试中他考了十五次，耗费了四十五年的光阴，可仍旧是一个南安府的儒学生员，连个举人都没考上。他抱着《四书》、《五经》越读越糊涂，竟然考居劣等，连官府供给廪生的膳食也被停了。又加上连着两年没有找到唯一能谋点食的教私塾的机会，弄得他是衣食单薄、吼儿病（哮喘病）发作，头巾破，靴头绽，被后生讥为“陈绝粮”。而人已到了将耳顺、望古稀的年纪，真正是陷入了“儒冠误人霜鬓丝”[1]（P2078）的可怜可叹的境地。

最可悲的是，陈最良虽挂了个读书人的名份，但除了“子曰”、“诗云”、“后妃之德”等腐言陈语外，仅略知点祖上医术，以及卜占、堪与、风水一类“百杂粹”。此外，几乎对人世间一切大书小书都未闻未见，真正是汤显祖惟“不可与言文”的世间“拘儒老生”。难怪被杜丽娘的丫环春香骂为粗野老牛，痴老狗，“一些趣也不知”。[1]（P2087）

读书读到没有了一点生趣、意趣，“气色渐落”，甚至无暇玩赏“尺幅之外”的美妙人生，这实在是人性的扭曲、异化。

其三也，人虽有才，然“生于隐屏，山川人物居室游御鸿显高壮幽奇怪侠之事，未有睹焉。神明无所练濯，匈（通“胸”）腹无所厌余。耳目既吝，手足必蹇（jian 迟钝）”。[1]（P1134）

“生于隐屏”，或是命运使然，本不足怪，但就怕心灵囿于隐屏而自囚，自我封闭自己的心灵之眼。本来，灵性、睿源并非仅仅来自书本，而是要以旷达的心胸吸纳书里书外的感性世界才能获得，这就是汤显祖所说的，“采真气乎天姥，瀑灵襟于雁荡”，[1]（P1031）让“日月漾其清华，山川郁其风雨”，[1]（P1033）以满目青山绿水，破隐屏之限，拥万千世界。

汤显祖笔下的南安府太守杜宝，虽自命“性喜书，牙纡插架三万余”，但在他

眼里，《四书》、《五经》要么是义理深奥，要么只是以道政事，要么就是“孤经”，总之，都“与妇女没相干”，而《诗经》“开首（《关雎》）便是后妃之德”。正是这位杜太守让陈最良教自己的女儿杜丽娘“习《诗》罢”，可他却万万没有想到，杜丽娘却从“关关雎鸠”的叫声里听出了情，悟出了爱，走出了心灵的隐屏，融入了姹紫嫣红的人间大花园，受神明练濯，让胸腹充盈，撰写了一部“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的人间大书。这恰恰正是汤显祖自己的人生写照。

汤显祖从来都是用心灵去读书，去感悟书里书外的“山川人物居室游御鸿显高壮幽奇怪侠之事”，尤其是他从不作壁上观，而是用生命去体验、创造，谱写自己的特立独行的诗书。他一生都在诗意地观照着“在场”的现实世界和“非在场”的心灵世界，哪怕是在人生最困厄的时日，他也要“凄然成韵”，让“风霞余物色，山水澹人心”，永不倦怠地、诗意地提炼、升华自己的人生境界。

万历十九年（1591年）五月十六日，汤显祖因上了一纸对皇上也颇有微辞的《论辅臣科臣疏》而震动朝野，被贬官到瘴疠之地的广东徐闻。他从留都南京回到临川，没想到又患了一场大病，高烧中病枕魂销，“梦如破屋中月光细碎黯淡，觉自身长仅尺，摸索门户，急不可得，忽家尊一唤，霍然汗醒”。可知，他的病虽来自甚猛的疟疾，使他本就清羸的身体更加瘦弱气虚，指腕寒痛。但这病更来自他的心火烈烈，来自他对“命飘危叶起”、“谪迁方渺渺”的前景的忧虑。那梦中“破屋踉跄苦索门”的隐喻、象征是不言而喻的。汤显祖深感仕途不得其门而入的苦闷。他在心中呼唤苍天，“滞泣海南图”前，为自己“才情尽”、“力命阻”而惋叹。

但即使在这人生巨大的坎坷面前，在这“南飞此孤影，笱峭行人稀”的境遇中，汤显祖也没有失却诗人之心，没有陷溺在悲凉深渊而失却自我。他仍顽强地将这多舛的命运“拟作三生度，惊看万死苏”，仍决意在这“悠悠岁将晚”（此时汤显祖已四十二岁，孔子曰，人生四十而无闻名，则不足畏矣。求仕途功名对汤显祖来说，的确太晚了）的岁月，“低头争末路，潦倒送穷途”。

从这年九月初汤显祖从临川城南瑶湖下船，直到百日后他到达贬官地雷州半岛上的徐闻，他一路诗意绵绵，让“名山纷我思”，让“山水澹人心”，吟哦谱写出他一生中最为密集的与山水相涵咏、与天地相交感的百多首心灵诗篇。[2]

汤显祖从初发瑶湖，到次宿广溪；从从姑山、郁孤台、梅花岭，到秋发猿岭；从保昌下船顺北江南下，到舜帝奏响美妙韶乐的曲江韶石；从南禅宗始祖慧能卓锡

处的曹溪南华寺，到乳源道中；又经子篙滩、恁头滩、泻洒滩、观世滩、翻风燕滩、浪石滩、大庙峡、浚阳峡，而后浴英德灵池水，饮白泡潭水、飞来寺泉，过清远回岐驿，上岭南光熙峰，在盘陀看日出；戏别冷提运，江望白云山，寄宿浴日亭；迂道罗浮山，夜坐冲虚观，避雨蝴蝶洞；出朱明观，入青霞洞，下飞云岭，舟行香山岙（澳门，当时已沦为葡萄牙殖民地达四十年），入海到溷洲，终返徐闻地。

这一路山水烟雨，寺观庙台，让汤显祖嗟（“世上浮沉何足问，座中生死一长嗟”）；让汤显祖啸（“摇心蹑光景，长啸凌虚无”）；让汤显祖叹（“嵌岨岂忘叹，念此孤游始”）；让汤显祖悲（“冥冥水波远，日暮心欲悲”）。他以“独自神仙尉”自嘲、自怜、自喻。即是“神仙尉”，也就把仕途轻看，所谓“宦迹他乡薄”，并不以仕途得失为意。

因此，“为官向南斗，只合注人生”。将贬谪之际遇，视为人生的情感体验，在这荆棘仕途上，与山川为意，与草木为邻，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天涯。

于是，神明经风烟练濯，胸腹借潮汐鼓荡。耳目即聪，手足必慧。仿佛“草树他乡别，风烟一处来”；似乎“壶觞荐潮汐，花木送炎凉”；况若“鹄祝人难忘，鹏扶尉欲仙”。

潮汐、草木、鹏鹄、风烟似乎都有了灵性，都与人世、人心相摩、相荡、相生、相亲。于是，天籁、人籁；天道、人道；天意、诗心相贯通，相涵摄。虽是“冥冥水波远，日暮心欲悲”，虽是“徘徊今夜月，孤鹄正南飞”，虽是“沧浪谁莞尔，歧路欲潸然”，但诗人仍不忘体会那“独眼秋色里，残月下风湍”的心悸，仍不禁品味那“石墨画眉春色开，有人江上寄愁回”的滋味，仍不能忘怀那“独棹青灯红树里，露华高枕曲江寒”的意绪。[1]（P411-470）